

辛弃疾接受史研究

程继红 著

教授论丛

吉林人民出版社

江西省教育厅 2001 年人文社会科学资助项目
(课题号: 0807)

辛弃疾接受史研究

程继红 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吉)新登字 01 号

教授论丛
辛弃疾接受史研究
程继红 著

主 编 王之望 周 坚

责任编辑 关 静

封面设计 刘梓钰

责任校对 郭武群

版式设计 李 丽

出 版 者 吉林人民出版社 0431 - 5649710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邮编 130021)

发 行 者 吉林人民出版社

印 刷 者 天津市武清开发区腾龙印业有限公司

开 本 850 × 1168 1/32

印 张 210

字 数 4000 千字

版 次 2001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1000 套

标准书号 ISBN 7 - 206 - 02866 - 7/I·180

定 价 580.00 元(全 30 册) 单 价 20.00 元

如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工厂联系。

内容简介

本书引进现代接受美学理论，以定量分析为手段，通过对各种选本、评本、注本、词话、笔记、文集的搜集，整理、发掘，展示了八百年来人们对辛词的接受观念以及普遍的接受规律，为今日辛弃疾研究建立在真实的历史基础上提供依据。对从事辛弃疾研究的同仁具有一定的启发和帮助意义，并具有一定的实用和参考价值。

序一

吴长庚

继红君之新著《辛弃疾接受史研究》稿本摆在吾案前，嘱余为序。继红与吾同事十七年，既同授古典文学课程，亦相与致力稼轩词的研究，其所学所成、所勉所求，吾深知焉，故乐为之序。

稼轩之词，慷慨豪放，于唐宋诸家之外，别树一帜，一时无两。其才高、其胸旷、其气豪。其生当弱宋末造，正可纬地经天；而身负管乐之才，无缘尽展其用。一腔忠愤，尽发词章。故其词悲歌慷慨，横绝六合；沉郁顿挫，冠绝古今。稼轩之晚年，寄居信州，筑室带湖，复迁铅山棋思之瓢泉，二十年中，吟风弄月，挑灯看剑，检校松竹，怨山惜水，写下了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丽词章。信州之青山绿水，成为稼轩词中不可或缺的情感载体。

继红君正当盛年，大学毕业后，即来吾校任教。十七年中，勤勉于学，不辍耕耘。辛未之秋，中文系举办纪念辛弃疾诞辰850周年国际学术会，继红撰文与会，得遍访辛学前辈，且窥辛词之渊奥，乃始有深研之念，其先致力于地方史料之发掘，力求解决稼轩词中所涉人物地理所不明者。其后数年，先后发表了《七百年词学批评视野中的辛弃疾》及《八百年辛词接受史实与分析》，一改往习，力求从接受美学理论之角度，对辛词作一全新考察。

以此二文为中心，继红君乃深入全面搜集了稼轩词流传与传播过程中之发展与变异，调查考察了稼轩词之历代词评家与历代

词选家之基本情况与“消费”状况，由此形成辛弃疾接受史的基本框架。《导言》中，乃将此勾勒为重点读者史、声名传播史、创作影响史、阐释评价史、期待视界史。其能据此而深入阐释以成完璧，则此书角度之新、命意之奇、视野之宽、价值之高，均可预卜矣。

余读继红之书，初阅尚唯唯，再阅而觉新，三阅而得味。盖其上编所用统计学之方法，将辛弃疾各阶段作品之被选、单项作品之被选，以及各阶段之被点评、单项作品之被点评，均一一诉诸计量。计量既成，乃据以作辛词消费规律之分析，从而对历代辛词研究之相关问题提出新的不同的看法。下编重点从理论上阐述稼轩词批评史论，当为全书之主体。分南宋、金元、明、清、近代五章，历述 52 位词学批评家之论，所在皆独出蹊径，别有灼见，不复重蹈前人之旧辙也。

窃以为，该书之义有三：将研究对象由作家作品而转向读者，此其一也；建立起单个作家接受史，将为创作新的以读者为重点研究对象的文学史铺平道路，此其二也；将全书之意义设定于一个开放的永未完成的基点上，使之具有充分的召唤意义，此其三也。

余不揣浅陋，略陈管见，是为序。

二〇〇一年十一月于上饶师院芳润斋

序二

陈东有

有关辛弃疾的研究，无论是其人还是其作品，已经是非常之丰富了。这是因为辛弃疾一生是位战士，一位热爱自己故园、并愿为收复故园而牺牲的战士。又是一位伟大的词人，一位豪放词与婉约词在他手上都有新的创造的词人。特别是豪放词，作为一位战士的豪放，已是达到了中国词史的巅峰。还是一位性格和生活都非常复杂的普通人，其复杂和普通都给人们留下了想象和研究的广阔空间。在一大批宋代词人之中，他是留下资料较为丰富的一流词人，因而也是人们研究得较多的一流词人。也正因为此，一方面我们说辛弃疾的研究由于成果越来越多而显得越来越不容易，一方面又可以说辛弃疾的研究还有许多工作可做，特别是与古不同、与众不同的新的研究还有许多工作可做。

继红先生在这本《辛弃疾接受史研究》中所做的工作，是与古不同，也与众不同的工作，是辛词研究中的创新。

以数量分析手段对辛词进行定性分析，是我们应该做的一件有创造性意义的工作。我们可以说，辛词深受大家的欢迎，这只是一个估测而已，辛弃疾是一个伟大的词家，这也只是研究者自己的评价而已。确定辛词在中国词史上的地位，确定辛弃疾在研究者和欣赏者心中地位，除了必须进行的单纯的定性分析外，应该有一个量的表述。但是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史上，要对一个名家作量化的分析，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由于资料不全，由于过去的研究和评价往往散见于各种选本和评点注释之中，难以用一种平台进行量化的整合并作出定量的结论；当然更主要的是传

统的研究对量化分析不以为然，十分的轻视。所以即使在近年来的古代文学研究中，有一批中青年研究专家已经开始借助计算机对《诗经》、唐诗、宋词、《红楼梦》和《中原音韵》进行了研究，但中国古代文学的量化分析和定量结论还是不多的。我自己曾经在读汉语史硕士时，在导师罗元诰先生的首肯和支持下，尝试着对《元曲选》中的音释部分以定量分析的办法进行了分类研究，得出了与以往关于“入派三声”的不同的看法。我对自己的这一研究结果并不满意，因为“与众不同”，但由于是量化分析得出来的，那是历史的真实，我不得不接受。我在写《人欲的解放——明清社会经济变迁与大众审美》一书时，涉及到社会、经济各方面的问题，用了大量的数据来分析论证，定量分析的方法是非常有用的。但我的研究还没有达到像继红先生研究辛弃疾这样程度，继红先生是在对单一作家及其作品的研究中运用定量分析方法，有更多的问题和困难要解决。也正因为此，我对继红先生的研究，不仅感兴趣，而且十分的钦佩。

学术研究，许多工夫是做在“文章”之外，许多辛苦也表现在“文章”之外。所以不少的学术研究，看起来并不复杂，然而得来却很不容易。古代文学研究引进定量分析，就要做大量的“文章”之外的工作。用定量分析的方法研究辛弃疾，不仅需要大量的资料搜集工作，如用心去搜集各种选本、评本、注本，各种笔记、文集，还要做大量的整理工作，要把传统的定性分析转化成自己研究的数据，然后再由此得出自己的结论。这种结论比我们传统所做的定性分析更具有科学性，更有说服力，但要化更多的力气。本书上篇《近八百年重点读者的辛词接受与消费调查》就是一种看似容易却艰辛的工作成果。看了这个成果，我们才能更确切的认知辛弃疾及他的作品，才能确切地知道“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和“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等等名句被多少人传读多少

人评价，才能确切知道辛词中哪些词最受欢迎，又受到了怎样的欢迎。从而实现研究者自定的任务目标：“通过整理、发掘并集中展示八百年来人们对辛词的观念以及普遍接受的规律，从中窥探古今著名词选到底选辛弃疾哪些作品最多，词评又最关注哪些辛作而给予了点评，反映效果强烈、声誉较高的作品在辛弃疾各阶段的分布状况，词选与词评在认识上的异同等等，从而对八百年来辛词接受史、辛词效果史进行整体再现，为今日之辛弃疾研究建立在真实之历史基础之上提供依据。”

继红先生从事辛弃疾及其词作的研究，已有十五六个年头了，记得我们在 1984 年毕业分手后不久，我就得知他在全心从事这项工作。他说，他所处的上饶地区就是当年辛弃疾生活了二十多年的地方，这里不仅有大量宝贵的文物资料，而且由于上饶师专（今日之上饶师范学院）有一个水平很高的辛弃疾研究集体，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1990 年，上饶举办国际辛弃疾学术会议，他就拿出了较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参加大会，并做了学术发言。此后十余年至今，他一直勤奋不已。由此而观，本书的下篇《历代稼轩词批评史论》当是他十多年来研究辛词后个阶段性总结。此下篇《史论》内涵之丰富及其成就之大，可由专家和读者们去评价，我认为继红先生作为一位青年学者，在学术研究的成果和方法上至少作出了如下贡献：

一是为我们的研究者们提供了关于辛词研究史中的接受史的学术过程的总貌。作为学术成果，这一进程总貌对我们从事辛弃疾研究的同仁具有重要的启发和帮助意义；作为研究方法，尤其对今天一些青年研究者在如何从事研究古代作家及其作品的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做古代作家作品的研究，最重要也是最辛苦的就是要先知世而后论人论作品。这种“知世”，不仅要知作家作品所在之世，还要知作家去后之世和作品的流传之世。辛弃疾及其词作的研究的最大难度，特别是关于“史论”性质的研究

的最大难度就在于此。这就要求研究者要坐得下来、静得下来，做大量的资料的搜集、整理、分析工作。我记得我们的老校长戴执中教授给我们的毕业赠言：“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前一句是因，后一句是果。没有十年冷板凳的学问工夫，就必然会写出空文章来。继红先生以自己十数年的努力，为辛弃疾和辛词研究领域的开拓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二是鲜明地论述了自己对辛弃疾其人其词的历史的理性评判。继红先生有一句话说得好：“任何时代对任何作家的接受，任何人对任何作品的接受完全超越其价值体系是不可能而且也是完全不成立的，因为缺少价值标准的评判本身就是毫无价值的‘零评判’。从这个观点看，不管哪个时代或哪个时代的哪个阶段，不管人们对辛弃疾是褒或者是抑，不管论者怀揣什么样的价值标准，反正只要他们将注意力投入辛弃疾，就证明辛弃疾有值得注意的地方。”这种历史评判的价值取向表明继红先生在对辛弃疾及其词作的研究过程中的理性批判精神和科学态度。作为一个青年学者，在经济浪潮翻腾、社会太多浮躁、人文科学艰难之时，仍然坚持这种理性批判精神和科学态度，既是应该的，也是十分可贵的。也正因此，我们才会获得继红先生的这一重要学术成果。

继红先生以自己的这本《辛弃疾接受史研究》在辛词研究领域做了创造性研究工作，的确与古不同，与众不同。

谨以此序述之。

辛巳中秋之夜于南昌大学西无斋

导 论

众所周知，接受美学是二十世纪上半叶在西方兴起的一种文艺理论。1967年德国康茨坦斯大学的文艺史家、文艺理论家H·R·尧斯发表了《作为向文学科学挑战的文学史》一文，首次宣告文艺批评的新观念与新方法——接受美学的诞生。要之，“美学”在这里并非黑格尔经典意义上的对于美的规律的阐发，也非丹纳的“艺术哲学”，它没有对美的本质、艺术的本质、美的形态等作出应有的科学性解释，而是以现象学和阐释学为理论基础，把文学研究的重点放在读者的接受上，探讨读者能动的接受活动在文学传播中的地位与作用，目的是企图建立一种自足的、独立的文学接受史，或读者文学史。

人类的理解活动是变动、不确定和具有历史性的，这样一来传统阐述学认为本文存在着的客观“原意”便不存在了。那么，本文的意义存在哪里呢？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中指出，任何理解都离不开解释主体，都是本文拥有的过去视界（受过去环境，时代诸因素影响而成的视界）同解释主体拥有的现在视界融合后新产生的现时视界。本文的意义就存在于“现时视界”之中，但“现时视界”是随着读者的变化而变化的，因此是变动的，不确定和具有历史性的。以对辛词的理解为例，南宋、元、明、清及近代的解释者以他们当时的“现在视界”与辛词已拥有的“过去视界”发生融合，从而形成了新的“现时视界”。但在今天看来这又统统都是历时性的了。而我们今天的“现在视界”，在若干年以后又变成后人所认为的历史上的“现在视界”了。这就是中国人常说的“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在这个意义上，本文的意义结构是呈开放状态、具有召唤意味、并永未

完成的。正因如此，从接受学角度去研究辛弃疾作品在不同时代、不同历史阶段中被阅读、理解、阐释、评价、影响、传播等被接受的情况，才有了现实的意义。



虽然接受美学理论崛起于六十年代，在中国的传播也不过十几年的时间。但是从接受美学角度对中国古典文学进行研究在中国早已开始，不过当时的研究者未意识到这就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出现的“接受美学”的方法而已。例如关于《诗经》、《楚辞》的研究，南宋便有朱熹的《诗集传》和《楚辞集注》，现代有张树波的《国风集说》、游国恩的《离骚纂义》；关于《庄子》，清代有郭庆藩的《庄子集释》；关于古诗有隋树森的《古诗十九首集释》；关于李白有詹英《李白集校注集解》；关于杜甫有叶嘉莹《杜甫秋兴八首集说》。这些虽称不上是严格意义的接受学研究，但至少可视为是对接受主体的资料搜集，这其实是接受学研究的起点和前提。此外，在中国关于许多作家们的研究出版了不少的资料汇编，如《三曹资料汇编》、《陶渊明资料汇编》、《李清照资料汇编》都是对历代重要读者、重要阐述的搜集，这也是接受研究必需要做的工作。至于象《诗经研究史》、《楚辞学史》、《屈原问题论争史稿》、《陶学史话》则已涉及接受学研究的重要方面即阐述评价史、视野史等。虽然上述研究没有自觉地运用接受美学的理论，但在研究方法、角度上已与该理论产生了暗合。

从对接受美学所产生的兴味出发，并以此理论来观照中国的学术史，实际有许多有趣的问题值得提出，并且应该做出必要的解释。中国的解经史自古以来便有“我注六经”与“六经注我”之争议，由此而出现了汉学与宋学的分野。传统的看法是认为

“我注六经”要比“六经注我”略胜一筹。为什么？因为“我注六经”总是在以“六经”为主，即使出现各种注法、注解，但都是以“六经”的客观原意作为追求目标的，这是许多著者的学术理想。但“我”由于是处于被动之地位上的，即使“皓首穷经”而终于收获不大，由此成了于世无益的腐儒、迂儒也大有人在。

“六经注我”，则是以“六经”为载体，以“我”为主体，借注“六经”，而阐发自己的哲学观。比如在唐代，与古文兴起的文学和哲学的主流运动相同步的是儒家经典研究中的一种新倾向，这种倾向之所以“新”，便在于它对太宗时期的《五经正义》这样的标准注释本产生了反动，这个反动首先起于重新诠释编年史《春秋》。啖助（725 - 770）是这一新倾向的带头人。他对《春秋》的诠释，一反前代学者恪守确立于汉代的三家传注中某一家的传统——公羊、谷梁和左氏，啖助主张废弃三家传注的权威，直接回到经典本身。后来的柳宗元集团受啖助的经学学派的影响较大，这种影响甚至比古文运动起的作用更大。柳宗元考辨《文子》、《晏子春秋》、《亢仓子》等的真伪和探讨《论语》的文章，以及在流放期间写的批评《国语》的著作《非国语》，都渗透着“六经注我”的独立自主、不愿盲从传经的精神。到了宋代，我们发现有不同的思想家分别侧重于“我注六经”和“六经注我”，而其中以“六经注我”的成就为最大。这是因为朱熹的集大成的综合哲学体现出的新儒学，成功地利用了对经典的诠释而作为其思想的载体。我们假若站在今天的接受美学的立场上来看待“我注六经”和“六经注我”的分野，该理论明显地确认了后者的合法性，因为本文的开放性、召唤性和永未完成的意义结构，为“六经注我”提供了先念的一切可能。

有人说全部的西方哲学是对柏拉图的一连串注释，而全部的中国哲学也是对《四书》《五经》以及老、庄等古代经典进行注释的结晶。就中国文学而言，全部的文学史若按接受美学理论观

点就是文学作品的消费史，是被读者阅读、接受的历史。研究的重点由作品转向读者，实际就是对“六经注我”的方法，在现代接受理论意义上的追认。古典文学界关于新理论的接受与运用，比其它学科如外国文学，现、当代文学研究要稍晚一些，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在外国文学领域，就笔者所知的已有《歌德接受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3 年 4 月版）；而现代文学领域则有《文学接受与文化过滤——中国对法国象征主义诗歌的接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4 年 5 月版），讨论的是中国现代文学对法国象征主义诗歌的接受情形。而在古典文学界，除了前引的一些古代作家研究资料汇编和具有汇编性质的各家作品集解（释），以及从接受史的一个侧面对作家作品的研究史之外，尚未有专门的关于一个作家的接受史研究专著问世。虽然学术界有两次较大规模的关于文学史写作的方法论大讨论，但讨论的结果终未能使文学史的写作与接受美学理论完全挂钩，近十年来不断有新版本的文学史著作出现，仍是传统的写作方法，无非在材料的扩充、新成果的吸收上较前有进步，理论意义的新框架则不见消息。今天看来，这个全新的文学史框架其实有许多具体的工作要做，因为要从接受美学角度写一部真正以读者为重点的文学史、文学消费史，则必须建立在对每一位作家的个人接受史进行详尽研究的基础之上，而这种个案又实在太多太多。远比以年代为线索，对作家作品进行历史性的描述要复杂得多。因此，建立单个作家的接受史档案就非常必要了，辛弃疾接受史就是基于这种思考而进行的研究。

二

在历代词人中，关于辛弃疾的研究已有相当丰富的成果。仅 20 世纪，研究、评论辛弃疾词的论著篇（种）数，据台北文津

出版社 1993 年出版的，黄文吉主编的《词学研究书目》（1912——1992）统计，便有 893 篇（种）之多，若将近十年的论著加进去，定会突破一千大关。虽然在这些论著中对辛弃疾接受史研究尚未形成自觉的趋向，但关于辛词的影响、评论等方面的研究我们都可纳入到接受史的范围之内来对待。目前，就笔者的目力所及，虽未标明使用接受美学理论，但实际上已经从事了这方面的研究的论著，我们觉得严迪昌先生的《“稼轩风”与清初词》一文便是典范。严迪昌先生对稼轩词的影响史——清初阶段，作了令人信服的详尽研究，他的结论是清词的所以得而“中兴”，“稼轩风”是卓有功绩的。1996 年，笔者开始对辛弃疾接受史进行研究，发表了《七百年词学批评视野中的辛弃疾》。1997 年受王兆鹏、刘尊明二位先生《历史的选择——宋代词人历史地位的定量分析》一文启发，写了《八百年辛词接受史实与分析》，这两篇文章是笔者对辛弃疾接受史框架的初步搭建。

一般而言，运用接受美学理论来研究一位作家的接受史，应在历时形态上把握五方面的脉络：重点读者史、声名传播史、创作影响史、阐释评价史、视界史。我们关于《辛弃疾接受史研究》的上编，主要是研究重点读者史以及声名传播史。关于前者的研究是一目了然的，因为历代词选本的选家们和历代对辛词点评的评家们，都是重点读者。辛弃疾的声名传播也主要是依靠他们的选与评。关于他们的选与评的结果我都以调查的方式全部罗列于每一首词之后，这样做的过程虽然有些繁琐，但目的却是想为读者提供一个更为可靠，更为有效的结论。当代史学，包括整个社会科学的研究，都十分强调民意测验，抽样分析、统计归纳、信息及反馈处理等。其实，我们对辛弃疾接受史的研究，搜集各式各样的读者反映，正是最好的民意测验，综合性地分析这类反应，就可以获得切切实实的来自接受主体的种种意见。尤其

是关于对具体作品点评的评语，其附录于每一首词之后的做法，更是为方便读者的检索，相当于辛词集评，具有实用的功效。我们把重点读者对辛词的选与评，视着是一种消费的行为，如果这个比喻还贴切的话，那么它无非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并不是所有的产品都能进入消费市场的，辛词的情况也是如此。读者对作品的筛选，就象市场对产品的筛选一样，是许多因素共同促成的结果。从历时的角度看，一时代有一时代的读者期待视野，因此一时代便有一时代的辛词接受史实。但不管时代怎么变，读者的期待视野怎么变，对于辛词的接受在差异中也有共同之处，这就形成了跨越时空的接受共时现象。比如我们在对 20 世纪以前和 20 世纪的 18 种词选本录选辛词的调查中，就发现了他们对辛词的某些作品的“点击”几乎是不约而同的，这种共时性特征，还表现在评论家们的不约而同上，说明辛词的有些作品的价值确实是永恒的。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这些重点读者成就了辛词的重点作品，也使这些作品的声名传播有了可靠的前提。当然词选的编者（重点读者）也构成了辛词传播的主要角色，而词评的评家们对传播作用一点也不比选家们差。我们在上编虽未能对辛词的传播史进行归纳与分析，但事实上它已经暗含在两大调查之中了。又因为篇幅的限制，从历代辛词的版本上也可推断出辛词传播的情况，这也是传播史要研究的重要内容，可惜未能做到。

在下编，我们主要研究的是辛词阐释评价史和视界史。它既同于传统研究中的“研究史”又不尽相同。因为在这一编中，我们把以往的“研究史”不考虑的或不太注意考虑的视界史，与阐释评价史结合起来。视界史即读者的时代阅读视界史。读者的视界是有期待性的，正是这种期待性使作品具备了开放性。因此，作品的内涵、价值都因读者的期待视界而不断地获得不同的阐释与评价。这种不同不仅反映在不同时代、不同读者的身上，而且还反映在不同阶段中的同一读者身上。以陈廷焯为例，他早年对

辛词的阐释评价和晚年的就不相同。这说明在不同的阶段，随着期待视野的变化，同一读者对同一作家同一作品的阐释也跟着发生变化。在近代，王国维以其不同于一切传统读者的崭新的期待视界，给予了辛词以全新的阐述。总结自南宋范开以来所创造的辛词阐述模式，我们发现凡是对辛词表示推崇者，都无一例外地对范开阐述模式有所继承和发展。他的理解与接受，将在代代相传的接受链上保存其丰富的痕迹，例如在刘克庄、刘辰翁、元好问那里，就有明显的范开成分，这样就构成了“范开式”的接受链条。而贬抑辛词者，则是以正变理论作为其阐述的指导，把辛词以及范开的阐述模式都纳入“变”之不“正”的行列，排除在词统之外。这样综观辛弃疾词的阐述史，就形成了两个鲜明对立的阵营。关于辛词阐述的推进就是在这两大对立阵营互动中而得以成为可能的。在中国词学史上，这种现象是非常独特的。质言之，辛词的成就历来都是颇受争议的，唯其受到争议，方使辛词阐述评价史变得丰富而深刻。而这种不同的阐述评价，都是由读者的期待视野所决定的。因此，在这个意义上，阐述史就是视野史。那么对辛词阐述史的研究便可以转变为对时代阅读视界的历史描述，这就是我们在下编没有将辛词期待视界史单列的原因。

在我们上面所引的关于辛弃疾接受史五大脉络中，以创作影响史为最生动。辛弃疾的创作影响史，始自于辛弃疾还活着的时候，那时候他周围的词人如刘过等就明显得其浸润。就南宋爱国词派来说，“如以辛弃疾为盟主，那么张孝祥、韩元吉、陆游、陈亮等与之揖让，声气相同，或为友军，或为羽翼，阵营是够壮大的”^①。这是指辛词对当时的创作影响而言。到南宋末，辛词对刘克庄、刘辰翁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在元代对元好问等的影响，在清代对清初词“中兴”的意义以及对阳羨词派的影响更是有目共睹。当然这仅仅是对辛弃疾创作影响史所作的线性描述，

^①吴熊和《唐宋词通论》P247 浙江古籍出版社·杭州 1985 年第一版